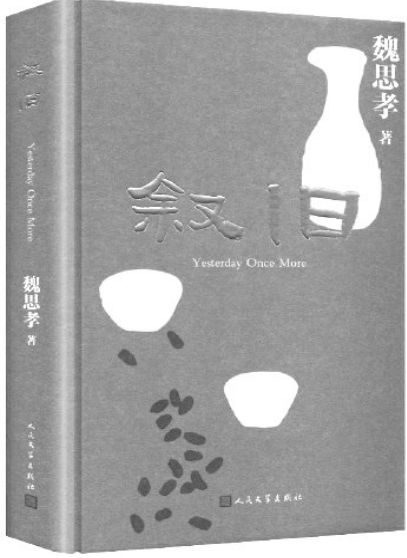


在记忆的河床上行注目礼

汪 鹏

看点 近日,魏思孝的新作《叙旧》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家以其冷峻而悲悯的笔触,延续了对乡土中国与小城图景的深度勘探。作为其“乡村叙事谱系”中的重要一环,这部作品既承载了《土广寸木》《王能好》等前作中“为小人物立传”的视角,又通过《事迹》《诗人》《业余》等篇目的结构性创新,进一步拓展了乡土书写的文学边界。



魏思孝作为新一代乡土文学的代表者,以其冷静而饱含悲悯的笔触,构建了一个属于当代乡村与小城青年的文学世界。结合魏思孝一贯的创作主题如《土广寸木》《王能好》等作品,可以清晰地捕捉

到他独特的写作风格与精神指向。他的写作是对乡土变迁的忠实记录,具有强烈的当代性。在《土广寸木》中,他采用“文字纪录片”式的白描手法,将北方村庄“辛留村”的日常细节、生老病死、人情往来悉数捕捉,不虚美、不隐恶。这种写法并非为了怀旧或抒情,而是为了“反抗遗忘”,为那些在宏大叙事中缺席的无名者立传,在看似琐碎的个体生命痕迹中,折射出乡土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刻变迁。

魏思孝笔下的乡村并非封闭自足的桃花源,而是处于剧烈溢散与重构中的流动空间。“村庄的根脉不再是土地,而是一个个具体的村民”,村庄沿着村民“出走的足迹与亲缘谱系向乡镇、城市甚至更遥远的地方蔓延”。这使得他的作品超越了静态的乡土描写,而成为对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动态追踪,具有社会学与人类学意义上的观察价值。

作品《行注目礼》蕴含着深刻的时空对话结构。小说通过“过去/现在”的双线叙事,架设起“今日之我”与“过去之我”对话的桥梁。这种结构不仅是技巧上的安排,更是一种生命哲学的体现:记忆不仅是封存的化石,而是可以被重新理解与诠释的活水。作者在回望中,“不仅是对过往记忆的忠实再现,更是一种经过时间发酵后的重新理解”。在这一过程中,代际之间的生命循环成为叙事的重要隐喻。“已逝的父亲”与“新生的女儿”形成了奇妙的生命回响,父亲的离世带来的生命缺憾与女儿的降生赋予的生命圆满,共同构成了叙述者生命中的完整循环,并最终“实现了精神层面的自我救赎”。梦境在魏思孝笔下也成为沟通生死的诗意空间,如“会飞的小猪”这样的超现实意象,既是对逝去父亲的思念,也暗含着“记忆对逝者的重塑过程”。这一切都指向同一个主旨:我们如何通过过去、与逝者的对话,最终完成与自我的和解。

魏思孝的文风具有极高的辨识度,其

核心是一种笑中含泪的黑色幽默。在他的作品中,常能看到“略带玩世不恭的语调乍看之下令人忍俊不禁,细读一番却会感受到一种不动声色的冷峻”。然而,魏思孝的幽默并非为了嘲弄。他“揶揄笔下人物们无伤大雅的微妙欲望,却从不加以居高临下的嘲弄或取笑”,在感情上始终与人物“亲密无间”。这种冷峻与热忱的并峙,形成了他独特的叙事伦理——他既是冷静的观察者,也是内在的参与者。他“既不高干也不低于生养自己的村庄,而是站在理解乡村的位置上,怀揣着‘强大的同理心’记录乡村的世情百态”。

在叙事视角上,魏思孝倾向内在于人物视点的分享式叙述,而非外部的客观描写。正如卢卡契所区分的,描写是旁观,而叙述是参与。在《好汉们》中,魏思孝通过人物回溯性的对话,生成“一股暗流汹涌的命运感”。这种叙述方式让读者不仅看到人物的行为,更感受到他们的命运起伏与精神脉动。魏思孝的创作对当代乡土文学有着重要的拓展意义。他既继承了鲁迅、沈从文以来的乡土文学传统,又跳出了启蒙或浪漫主义的宏大话语,直面当下乡村的现实,提供了一种贴着地面飞翔的叙事范式,为乡土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叙旧》延续了魏思孝“贴地飞行”的创作理念,将视角聚焦于乡村与城镇的普通人。在《事迹》中,作者以近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笔法,记录了一位乡村老人在生命最后时光中的琐碎日常——修补农具、参加红白事、与邻居闲谈。这些看似平庸的“事迹”,实则是个体对抗时间湮没的微弱抗争。魏思孝通过解剖这些日常,揭示了历史洪流中无名者的生存哲学:他们不是史诗的主角,却是历史的基石。

《土广寸木》的创作理念在《叙旧》中得到进一步深化。书中《诗人》一章,通过一位乡村教师对诗歌的追求,映射出乡村的文化生态与精神生活。魏思孝以此完

成对村庄的“拆解”:乡村不仅是地理空间,更是文化身份与精神归属的隐喻。

《业余》一篇堪称全书主旨的凝练。主人公作为工厂的工人,却在业余时间沉迷根雕艺术,试图以创作抵抗生活的重复与虚无。这一形象与《土广寸木》中的人物形成呼应,但魏思孝赋予了其更积极的行动性:通过创造性劳动,个体得以在现实中重建尊严。这种“业余性”恰恰是对生命本真状态的回归。《业余》中对根雕制作过程的描写,堪称魏思孝“文字纪录片”风格的典范。作者以极简的笔触刻画刀锋与木纹的交互,几乎不带主观评价,却通过动作细节传递出人物内心的执着与孤独。这种白描并非机械记录,而是以物见心、以形写神的文学提炼,在克制中暗涌着抒情性。

《叙旧》中频繁出现的父子、师徒关系,构成了一种隐性的精神传递。在《事迹》的结尾,老人将一本记录村庄变迁的笔记交给孙辈,嘱托“别忘了这些旧事”。这一场景与《行注目礼》中“过去/现在”的时空对话结构一脉相承,揭示出魏思孝的核心意图:记忆不是怀旧的素材,而是理解当下、构建未来的基石。通过叙旧,个体得以在代际更迭中定位自身,完成从“漂泊者”到“守夜人”的身份转变。

值得一提的是,魏思孝作品中由频繁出现的自传性人物“卫华邦”,构成了一个连贯的叙事视角。通过这一角色,作者不断进行着“痛苦的自我质询”,反思写作作为本身是否在“贩卖”乡邻的“隐私与苦难”。这种自反性使他的写作超越了单纯的记录,而成为一种充满道德自觉的文学实践。从《土广寸木》到《行注目礼》再到《好汉们》,有一条清晰的精神主线贯穿始终——他以“守夜人”的姿态,为被时间洪流冲刷的个体生命作传,在记忆被遗忘之前抵达。他的文字,如同记忆河床上沉淀的“碎金”,在文学的星光照耀下,发出微弱而坚定的光芒。

生命的启明:师者的人格魅力

刘逸南

22篇跨越30年的记忆,烛照出六位师者“充实而有光辉”的生命景象。张新颖教授的《启明:杂记我的复旦老师们》(以下简称《启明》)以其温暖而深沉的笔触,打开了一扇窥见知识分子精神血脉与师道传承的窗口。这本书收录了作者30年间写就的22篇文章,记录了贾植芳、章诒恒、夏仲翼、骆玉明等六位复旦老师的行迹与心迹。这不仅是一部回忆录,更是一部精神史,它通过个体生命的“光影声色与家事、国事、天下事”的记录,烛现了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情怀和现实关切。

最打动人的部分,莫过于《启明》中对诸位老师生命底色的刻画。其中着墨最多的贾植芳先生,其形象尤为鲜明。张新颖笔下的贾先生,并非抽

象的学术符号,而是一个坚守知识分子风骨的师者。贾植芳一向乐观通达,张新颖认为,贾植芳的乐观源于他关心个人利益之外的事情,“始终关心着个人利益之外的事情,但又不是抽象的东西,而与具体的社会和历史、精神和理想、人和命运息息相关”。这种由“人的格局”的阔大带来的精神魅力,使得贾植芳成为真正有能力承担的人,这是贾植芳留给学生的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无论是夏仲翼老师讲授“外国文学史”时的那种宏阔而不空疏、丰富而不散乱的讲述方式,还是骆玉明老师讲课时“风烟浩荡,波涌浪激”,都在学生心中种下了人文精神的种子。《启明》不仅关注老师的生命底色,而且注

重他们的学术传承。

张新颖回忆夏仲翼的课堂:“那些年,我们还处在不知天高地厚的青春躁动中,夏老师的文学史课,却让我们不知不觉中沉浸到广阔而绵长的丰富世界。”这种教育的魅力,正在于它不仅知识的传授,更是整个生命状态的感染和熏陶。

还有不少学林逸事,让我们看到师者们的人格魅力。《启明》一书中,除了厚重的历史担当和学术传承,那些闪烁着人性微光的小故事,为知识分子群像增添了生动色彩。这些学林逸事,看似轻松平常,却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师辈们的人格魅力。

《启明》的价值不仅在于记录,更在于反思师道传承的本质。张新颖以

其细腻而深沉的笔触,展现了师辈们如何通过自己的生命实践,影响和塑造了学生的精神世界。他描述自己坐在贾植芳书房里的感受:“不知不觉中,心就安静下来,坚定起来。我的困惑和苦恼也慢慢地化解于无形之中,又在无形中培育起新的精神力量。”这种影响,不是通过刻意的教导,而是通过整个生命状态的感染。“那时候心里有一种奇异的宁静,又有一种对即将展开的世界的宁静的渴望。”这种“奇异的宁静”与“宁静的渴望”,恰是教育最美妙的成果——不是知识的简单累积,而是整个生命状态的改变与提升。《启明》展示了人文学科真正的生命力所在,是生命对生命的触动和启发,更是精神火种的传递。

重探“士人”转型的近代轨迹

陈华筠

■提示

《士变:近代中国的思想转折》通过对近代中国士人转型的全面考察,揭示了思想变迁与社会转型的交织互动。罗志田教授以“士变”为轴,串联起近代中国的多重变革,既展现了世变对士人的冲击,也揭示了士人对世变的主动回应与塑造。这种双向互动的视角,使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把握近代中国的历史脉络。



罗志田的新作《士变:近代中国的思想转折》(以下简称《士变》)以宏阔的学术视野和细腻的历史洞察,系统勾勒了从“士治”到“士变”的关键性转折。该书不仅是罗志田近年来关于近代中国思想与社会变迁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更以其独特的通论性风格,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把握近

代中国整体变迁脉络的可能路径。

《士变》一书突出的特点在于其提出了一个理解近代中国的核心概念——“士变”。罗志田敏锐地捕捉到,在近代中国的巨变中,士人群体不仅是变革的推动者,而且其自身也经历了深刻的身份认同、社会角色与文化理想的转型。这一“士变”过程,上达朝廷,下及闾阎,彰显了近代中国变化的根本所在。

梁启超曾言,近代中国处于“互起互伏,波波相续”的过渡时代。罗志田进一步阐释,当时从事到人心各个层面的演变遂常带有“士变”的意味。这一视角打破了传统思想史研究中关注思想内容演变,而是将思想变迁、社会转型与士人自身的嬗变有机结合,呈现出更为丰富多元的历史图景。通过“士变”这一概念,罗志田试图贯通地考察近代中国的世更迭与人心流转的互动。如他所述,既希望在史学中呈现思想的作用,也力图在世变中揭示思想的转折。这一方法论追求,使得《士变》既不同于纯粹的思想观念史研究,也有别于单纯的社会史分析,而是在二者的交叉地带,开辟出了一条理解近代中国的新路径。

“士治”的传统社会格局是理解“士变”的历史起点。《士变》一书的结构安排体现了罗志田对近代中国士人转型历程的深刻把握。全书从“士治”的传统格局谈起,逐步展开士人在近代世变中的多维转变,最终指向一个持续变动中的知识阶层的新生态。罗志田在下章中,细致梳理了从“郡县空虚”到礼下庶人的历史进程。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士人,不仅在朝为官辅助帝王治理天下,在野时也作为地方士官领导民间社会。这种独特的“士治”秩序,通过科举制度、宗族组织、地方公益等多种机制得以维系,成为传统中国社会得以稳定运行的重要保障。

然而,西潮的冲击使得这一延续千年的“士治”秩序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罗志田在书中阐释,西潮大规模到来之前,中国学术自身已生出“务为前人所不为”的道咸新学。这表明中国社会内部已经孕育着变革的因子,而西方的冲击则加速并复杂化了这一过程。罗志田并没有简单套用“冲击—回应”模式,而是细腻地展示了中国士人如何主动地、有选择地应对外来挑战,并在这一过程中重新定义自身的社会角色与文化使命。

科举制度的改革与最终废除,成为士人转型的关键节点。罗志田将这一变革称为“千年大举动”,其在第六章中详细分析了科举制度改革对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科举制度的废除,不仅切断了士人向上流动的传统渠道,更导致了“士与大夫分离”的直接后果,这一制度性变革,使得士人不得不重新寻找自身在社会中的位置,也迫使他们在思想观念上进行调整与创新。

在这一思想转折的过程中,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的复杂互动得到了充分展现。罗志田提出,近代中国的“新、旧、中、西”确有独特的一面,又并非孤立,而是一直处于密切的关联互动中。这一洞见打破了简单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可以更加辩证地看待近代中国的思想变迁。

罗志田对思想转折的考察,将思想变迁与社会转型紧密结合。在第七章“失去重心:清末民初思想与社会的权势转移”中,他精辟地分析了从西学不能为用到中学不能为体的思想权势转移,以及从士到知识人,再到知识人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青年的兴起这一社会权势转移的双重过程。这种将思想与社会连接起来的分析方式,使得对“士变”的理解更加立体和丰富。

对士人转型的分析,涵盖了政治参与、文化理想、社会角色等多个维度,《士变》一书全面展现了这一历史过程的复杂

面貌。

在政治层面,士人的转型表现为从传统“士大夫”到现代政治参与者的转变。罗志田在第十章中,细致分析了民初知识分子对政府作为的思考,最后转向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这一过程清晰地展现了士人政治理念与实践方式的转变。

在文化层面,士人的转型则表现为从传统文化承载者到现代知识生产者的角色转换。罗志田在第二章“道咸新学:19世纪中期的自我变革”中,分析了从经学到“一切诸学”的知识分化过程。这一知识学转型,不仅是学术研究范式的转变,更是士人自我认同与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义。当传统的“读书”行为——一种具有特定含义的行为方式,不仅是一种直观意义的阅读书籍或学习技术相关的行为——被现代专业知识学习所取代,士人也就不可避免地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在社会层面,士人的转型则表现为从“四民之首”到多元职业人士的身份重构。罗志田认为,科举制度的废除导致士人失去了传统的社会地位,而新教育系统培养出来的则可称为知识人。这种从“士人”到“知识人”的称谓变化,背后反映的是社会结构与价值系统的深刻变革。传统士人追求的是“无恒产而有恒心”的境界,而现代知识分子则不可避免地职业化和专业化,成为社会分体系系中的一部分。

作为一部考察中国近世思想巨变的通论性著作,《士变》展现了视野宏阔、洞察敏锐、剖析细腻的特点。罗志田凭借其深厚的史学功底和广阔的理论视野,将诸多分散的历史现象串联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展现了一幅连篇叠幻的历史长卷。这种对历史复杂性的尊重,使得《士变》能够避免过于简单的历史判断,而呈现出更加贴近历史本相的图景。



童书中的生态返乡

李海卉

一条桦皮船,载着都市少年驶向鄂伦春的森林;一位鹤爸爸,在黑土地上守护着忠贞的羽翼。这些故事开辟了一条通向自然的精神之路。在当代儿童文学创作中,作家正以充满生态意识的写作,为孩子们构建着一座座连接现代文明与自然故乡的桥梁。薛涛的《桦皮船》和李铭的《鹤爸爸》,同样扎根于东北的白山黑水,关注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以各具特色的叙事视角和艺术表达,展现了儿童文学在生态书写上的开拓。

薛涛曾这样定位自己:大块时间在河边的木屋

里读书、写作。“河边的木屋”让人联想到梭罗在瓦尔登湖畔建造的小木屋。梭罗在瓦尔登湖边两年多的生活实验,是一场“测量活动”——他想知道一个现代人在物质条件极度有限的条件下,可以在人生的矿藏中开采出怎样的宝物。梭罗最终证明:“只有在荒野中才能保护这个世界”。180年过去了,这个定理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更显迫切。薛涛和李铭的作品,在东方语境下呼应了梭罗的生态哲学。

《桦皮船》中的爷爷托布,某种程度上是梭罗式的角色——他背着一条亲手制作的桦皮船,对现代都市生活保持距离,坚守着与自然亲密接触的传统生活方式。城市男孩乌日对这些船充满好奇,也对鄂伦春族栖居地无比向往。作家薛涛通过乌日的视角,将儿童成长环境从现代都市溯回鄂伦春的原始森林,重现了少年成长的另一种风貌。祖孙二人携桦皮船返乡。他们乘火车、搭汽车、骑行、驾车,这一路的冒险,对乌日而言充满挑战。

在《桦皮船》的结尾,所有元素都在回归——李阿哈回归良善,豹子回归山林,桦皮船回归河流。这种“回归”主题,不仅体现在人物和动物的命运上,更是一种生态观念的传递——回归到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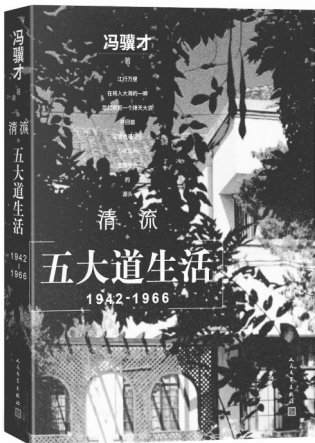
与薛涛充满诗意见想的风格不同,李铭的《鹤爸爸》注重现实主义的描写,展现动物世界的真情与命运。丹顶鹤妈妈因人类活动意外受伤无法南迁,鹤爸爸始终忠贞守候,最终在高原上与之生死相依。作家传递着超越物种的生命关怀,引导孩子思考人类活动对野生动物的影响。

《哈利·波特》中,罗琳创造了一个充满魅力的魔法世界,在那里自然万物都具有神奇的力量:猫头鹰可以送信、凤凰的眼泪可以治病。这与《桦皮船》中万物有灵的视角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与传统的自然写作不同,新自然主义在儿童文学中展现出鲜明特点。在《桦皮船》中,豹子、柳根鱼、白桦树不再是被观察的客体,而是拥有自己意志的主体。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生命平等意识的自然流露。乌日最终能够独自驾驶桦皮船渡过汹涌的呼玛河,依靠的不是超能力或魔法,而是在与自然相处中积累的观察力、适应力和勇气。日本作家宫城达郎的《兔之眼》,则通过孩子们与校园周围生物的互动,探讨生命教育主题。如果将视野放宽,我们会发现这种地域文化与生态意识的结合是一种儿童文学创作的新气象。

乌日独自划着桦皮船穿越汹涌的呼玛河,完成了他的成人礼。那个曾经在城市中不起眼的男孩,在大自然中找到了勇气和自信。当他骑着马奔向山顶时,他终于明白——自己就是“山”。这或许就是生态文学的价值:它让孩子们理解,我们并非自然的访客,而是自然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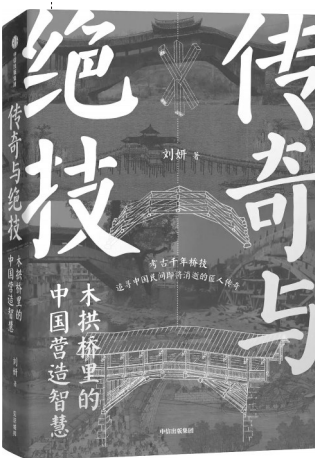
■荐书

打开尘封的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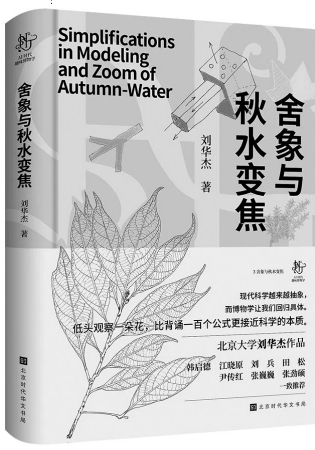
《清流:五大道生活(1942—1966)》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是马骥才新创作的散文作品。作者回溯上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的天津五大道生活往事,开启一段尘封的童年、少年记忆之旅。书中详述家族的往昔点滴、情感故事,个人的求学、恋爱经历以及亲友往来趣事等。在这些娓娓道来的故事中,五大道独特的文化韵味与历史底蕴跃然纸上。



《传奇与绝技:木拱桥里的中国营造智慧》
中信出版集团

本书并不仅是一部桥梁营造的技术史,而且是一次寻访与探索的漫长旅程。从宋人画作中的编木为之的无脚飞桥开始起步,引领读者俯身观察民间的筷子造桥的游戏,抬头仰望汴河上令人惊叹的虹桥。从东京汴梁,来到僻处小镇三魁,揭开了编木廊桥营造的传奇历史。



《舍象与秋水变焦》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本书从哲学、美学的经典理论切入,引出舍象与秋水变焦的思维体系,给出了一套从“表象剥离”到“视角切换”的完整思考流程。作者以“秋水”喻澄澈之心,以“变焦”喻视角调整,主张打破单一认知维度的局限,通过博物学的观察与思考,提醒我们放慢脚步,重新感受自然之美,并重建人与自然的诗意联结。